

历史复盘 怅望帝国梦 宿命俄罗斯

编译/鲁昊源

作为欧亚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国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不友好，其领导人普京更是长期对

起伏浮沉“俄国梦”

科特金教授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永远在与“没落”苦苦抗争的俄罗斯形象：

从第一位沙皇“伊凡雷帝”（1547~1584年在位）的时代直到20世纪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约500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特点——总是怀揣远超其能力的野心。

历史上，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曾三次达到顶峰：16世纪彼得大帝战胜查理十二及其统治的瑞典，使俄国势力渗入波罗的海和欧洲；19世纪亚历山大一世战胜拿破仑，将俄国以大国事务的仲裁者形象带进巴黎；二战时期斯大林击败疯狂的希特勒，为俄罗斯（苏联）获得柏林并在东欧建立卫星帝国，也成功地使俄罗斯（苏联）扮演了塑造战后秩序的核心角色。

然而，这三段辉煌的时期，根本掩盖不了一个冰冷的事实：俄

“进攻是为了防御”

既然困难重重，俄罗斯为何始终放不下对大国地位的追求？科特金教授列出了三个主要原因。

首先，俄罗斯人民一直有特殊的使命感。他们觉得自己生于一个“受上帝庇护”的国家，在世界上是“特别的、例外的”。实际上，大部分强国，包括美国、英国和法国，都有这种“例外主义”的观念。不同的是，俄罗斯的角色很有弹性，随着时间而变化，从“第三罗马”到“泛斯拉夫帝国”，接着是共产国际的总部，再到今天的“欧亚主义”中心（认为俄

上接《E1

西方千年“恐俄症”

厚重的历史尘埃为偏见的诞生提供了土壤。梅栋写道，“在西方和史学家的话语中，只存在‘东方大分裂’，而显然，实际应该是‘西方大分

修正为了遗忘？

二战结束后，因为冷战和德国民主化，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着一股修正之风，有意抹杀苏联对二战胜利的贡献。

紧接着，梅栋开始分析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和美国在反俄上的不同表现和演变。

拿破仑1812年亲征俄罗斯前夕，曾命令一位作家写一本名叫《从诞生之初到14世纪的俄罗斯变强历程》的书。此书不断再版，并翻译成多种语言。书中主要评论了一份所谓的彼得大帝命令帝国扩张的遗嘱。据此，该书作者提倡各国孤立俄罗斯。直到1879年，这份所谓的遗嘱才被证伪，但这样的谎言已成功引起各国对俄国的畏惧。

尽管伏尔泰和开明专制的拥护者对俄国仍抱有同情，同样来自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，还是因其“东方专制”而视俄罗斯为政治的反面教材。

法国的反俄情绪随着一本名叫《1839，俄罗斯旅行笔记》的出版

从“贝壳放逐”到“橙色革命”

“流言耳语比武力更容易让人接受”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引发各地的“橙色革命”，如2004年和2014年的乌克兰、2004年的格鲁吉亚、2005年的吉尔吉斯。

在上述提及的现象中，梅栋回想起雅典的“贝壳放逐法”。他认为，结合19世纪到二战再到冷战的历史来看，俄罗斯的名字一直写在欧洲各国的贝壳上，俄罗斯总是那个被放逐、被排挤的国家。

当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，跟一千年前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做着同一件事：他们重写关于俄国的历史，改变欧洲关于俄国的记忆，就如神学家们在600年前对陨落拜占庭帝国所做的一样。俄国不应也本不该为历史承担如此多的责任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、当事人的枯萎，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：抹去俄国在消灭纳粹中的贡献，而幻想出一场纯粹的欧洲“大西洋主义”的胜利，甚至是让俄国为两次世界大战负责，

西方保持强硬的姿态，颇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满。

美国《外交事务》杂志年前曾组织一次针对俄罗斯问题的专题讨论，试图从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各

斯一直在强国的竞争中处于“相对衰落”的地位。这个国家曾输掉了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、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影响力大大衰退；而冷战的失利，最终导致苏联瓦解。

当然，在科特金教授看来，如果认为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就远离了对“大国梦”的追求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俄罗斯整体的战略推动力并没有改变，而且随着过去十多年普京的统治，这个国家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：建设强大的国家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。不幸的是，以下几方面的原因，令俄罗斯的强国之路崎岖难行。

一是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失去了大片领土，分离出去的国家当中，有很多加入了西方阵营或者在安全问题上与西方紧密合作。二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人

斯既不属于欧洲，也不属于亚洲，而是独一无二的欧亚混合体，都表现了这种自我定位。

其次，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奠定并帮助塑造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。除了太平洋和现在备受争议的北冰洋，这个国家没有其他的天然边界。历史上，来自东亚、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威胁，使这个国家总是有强烈的进攻性。这也是俄罗斯很早就受到扩张主义推动的原因。从俄罗斯的视角看，进攻是为了防御，只有向外扩张才能保护自己。在普京眼中，边界附

个角度，全面评估俄罗斯的发展潜能和对西方的威胁。

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斯蒂芬·科特金教授就此发表《俄罗斯永恒的地缘政治——普京重返历

均财富难以跟西方抗衡。按美元计算的话，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只占世界总量的1.5%，仅相当于美国的十五分之一。同时，这个国家还充满了腐败，权力寻租现象



当地时间2018年11月28日，乌克兰基辅，民众聚集在当地“海洋广场”购物中心举行反俄示威活动，据称该购物中心为俄罗斯商人开办。 本报资料室/图

近的前苏联国家，例如乌克兰，都是西方对俄发动攻势的武器，因此俄罗斯必须在这些国家保持足够的影响力。

第三个左右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因素，是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既定目标。因为缺少自然屏障，对俄罗斯来说，自身安全的唯一依靠就是强大的国家实力，这也是维持国内秩序的保障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加强国家建设的努力，在俄罗斯造成的后果是制度的崩溃和个人统治的形成。从彼得大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各个统治者，再到列宁时期

史旧路》一文，他认为，俄罗斯正在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而这条道路，是俄罗斯近几百年里不断在大国竞争中走向衰败的历史重现。

比比皆是。三是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。美国在全球事务的领导地位、以及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扩张，都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

他进一步指出：内部体制的恶化，是俄罗斯的国家能力得不到提升的主要原因。普京拯救了俄罗斯，却也把它拖入了泥潭，而且可能导致其没落。这位总统一再强调优先发展经济，却在更深远的内部体制改革中停步不前，反而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中。然而，俄罗斯要想真正与西方分庭抗礼，需要的是透明的、有竞争力的、负责任的政府；需要的是真正的公民服务、能起作用的议会、健全的司法制度、自由而专业的媒体，以及坚定的反腐败措施。

可惜的是，现任的俄罗斯领导者，并没有做到这些，反而将这个国家带回了之前野心勃勃而又不切实际的旧路上。也许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的策略给了其一些自信，但这样一个既虚弱而又渴求荣耀的国家，造就了一个独裁者（普京），结果使本应

俄美之争“冷与热”

虽然永恒的大国自豪感和特殊的使命感，使俄罗斯没有像其他“后苏联”国家那样投入西方怀抱；也使其永远不接受冷战中西方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事实。但残酷的现实是：如果俄罗斯不把野心降低到和能力同样的高度，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。科特金教授给出的思路是可以参照英、法两国的历史。这两个国家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才改变其战略，放弃了“例外主义”和全球使命。英、法两国拥有强大的经济、一流的教育、广泛的金融影响力和世界通用的语言，而俄罗斯不具备其中任何一条。即便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但缺乏其他构成大国地位的要素，因此不可能与美国、欧盟，甚至是中国平起平坐。

他进一步指出：内部体制的恶化，是俄罗斯的国家能力得不到提升的主要原因。普京拯救了俄罗斯，却也把它拖入了泥潭，而且可能导致其没落。这位总统一再强调优先发展经济，却在更深远的内部体制改革中停步不前，反而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中。然而，俄罗斯要想真正与西方分庭抗礼，需要的是透明的、有竞争力的、负责任的政府；需要的是真正的公民服务、能起作用的议会、健全的司法制度、自由而专业的媒体，以及坚定的反腐败措施。

可惜的是，现任的俄罗斯领导者，并没有做到这些，反而将这个国家带回了之前野心勃勃而又不切实际的旧路上。也许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的策略给了其一些自信，但这样一个既虚弱而又渴求荣耀的国家，造就了一个独裁者（普京），结果使本应

得到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了。面对这样的俄罗斯，美国该如何应对？科特金教授在文章结尾给出了建议：首先，美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俄罗斯从未长期维持过友好关系。毕竟，两国基本价值和利益有根本的区别：俄罗斯追求的是强大的国家；而美国则追求个人的自由、财产和人权。其次，美国也应该意识到，今天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希望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革命力量。恰恰相反，俄罗斯是在既定的大国游戏规则内寻求自身定位。更何况，和苏联相比，俄罗斯的力量更加弱小，美国不需要以冷战时的策略去应对。

真正的威胁，是俄罗斯希望西方承认其在前苏联领域内的支配地位（波罗的海国家除外），这是西方绝对不能同意的。但同时，西方又难以真正兑现向这些国家做出的承诺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可以采用乔治·凯南（1904~2005年，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，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）始创的“遏制”战略。

然而科特金教授认为，新的“遏制”战略只会使美国将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，采取一些冷战时期的陈旧手段，而这正中俄罗斯的下怀。

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

梅栋对西方媒体的常用宣传技巧进行了归纳。反俄的宣

传主要采用扭曲认知的方法，但外人难以察觉，因为这些宣传通常都由专家们加工过。梅栋透露，20多位乌克兰政府内的公关专家，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，就已成功地通过在西方媒体中炮制了反俄的“Newspeak”。Newspeak这个概念是由乔治·奥威尔在《1984》这部作品中创造的，意指用于宣传目的、控制思想的话语体系。

“Newspeak”的第一种构造技巧是词语的选择。例如，我们不说分裂主义者的反叛运动，而是说，俄罗斯武装恐怖分子。我们不说克里米亚回归祖国俄罗斯，而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。

第二个技巧是选择信息的来源。梅栋说道，“实际上，对有关俄罗斯的事件，媒体的引用对象也别有讲究，主要是一些在美国和欧洲智库中工作的研究员，以及另一些美国、欧洲和乌克兰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，还有一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机构，例如欧洲民主和安全中心、言论自由和人权研究所、和平分析中心等。

第三种技巧是任意地选用、重组事实，主要是扭曲事件的起因。典型的做法是确定一个事件开始日期，这个日期有利于一方，而损害另一方，事件日期的选择总是为接下来的争议做好铺垫。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子：关心事态进展的人会留意到，西方大媒体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14年3月作为乌克兰危机或是克里米亚被兼并的发生时间，

裂”。这个谎言成功地让天主教和西方无神论者相信，是东部教会而非西部教会造成了教会的大分裂。直至今日，谎言依旧横行，仅有极少数的

修正为了遗忘？

二战结束后，因为冷战和德国民主化，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着一股修正之风，有意抹杀苏联对二战胜利的贡献。

紧接着，梅栋开始分析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和美国在反俄上的不同表现和演变。

拿破仑1812年亲征俄罗斯前夕，曾命令一位作家写一本名叫《从诞生之初到14世纪的俄罗斯变强历程》的书。此书不断再版，并翻译成多种语言。书中主要评论了一份所谓的彼得大帝命令帝国扩张的遗嘱。据此，该书作者提倡各国孤立俄罗斯。直到1879年，这份所谓的遗嘱才被证伪，但这样的谎言已成功引起各国对俄国的畏惧。

尽管伏尔泰和开明专制的拥护者对俄国仍抱有同情，同样来自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，还是因其“东方专制”而视俄罗斯为政治的反面教材。法国的反俄情绪随着一本名叫《1839，俄罗斯旅行笔记》的出版

从“贝壳放逐”到“橙色革命”

“流言耳语比武力更容易让人接受”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引发各地的“橙色革命”，如2004年和2014年的乌克兰、2004年的格鲁吉亚、2005年的吉尔吉斯。

在上述提及的现象中，梅栋回想起雅典的“贝壳放逐法”。他认为，结合19世纪到二战再到冷战的历史来看，俄罗斯的名字一直写在欧洲各国的贝壳上，俄罗斯总是那个被放逐、被排挤的国家。

当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，跟一千年前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做着同一件事：他们重写关于俄国的历史，改变欧洲关于俄国的记忆，就如神学家们在600年前对陨落拜占庭帝国所做的一样。俄国不应也本不该为历史承担如此多的责任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、当事人的枯萎，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：抹去俄国在消灭纳粹中的贡献，而幻想出一场纯粹的欧洲“大西洋主义”的胜利，甚至是让俄国为两次世界大战负责，

西方历史学家愿意正视这段历史，例如美国史学家斯蒂文·朗西曼。

欧洲的王国们正如日中天，而拜占庭帝国正无可奈何地衰落，在西方

修正为了遗忘？

二战结束后，因为冷战和德国民主化，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着一股修正之风，有意抹杀苏联对二战胜利的贡献。

紧接着，梅栋开始分析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和美国在反俄上的不同表现和演变。

拿破仑1812年亲征俄罗斯前夕，曾命令一位作家写一本名叫《从诞生之初到14世纪的俄罗斯变强历程》的书。此书不断再版，并翻译成多种语言。书中主要评论了一份所谓的彼得大帝命令帝国扩张的遗嘱。据此，该书作者提倡各国孤立俄罗斯。直到1879年，这份所谓的遗嘱才被证伪，但这样的谎言已成功引起各国对俄国的畏惧。

尽管伏尔泰和开明专制的拥护者对俄国仍抱有同情，同样来自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，还是因其“东方专制”而视俄罗斯为政治的反面教材。法国的反俄情绪随着一本名叫《1839，俄罗斯旅行笔记》的出版

从“贝壳放逐”到“橙色革命”

“流言耳语比武力更容易让人接受”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引发各地的“橙色革命”，如2004年和2014年的乌克兰、2004年的格鲁吉亚、2005年的吉尔吉斯。

在上述提及的现象中，梅栋回想起雅典的“贝壳放逐法”。他认为，结合19世纪到二战再到冷战的历史来看，俄罗斯的名字一直写在欧洲各国的贝壳上，俄罗斯总是那个被放逐、被排挤的国家。

当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，跟一千年前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做着同一件事：他们重写关于俄国的历史，改变欧洲关于俄国的记忆，就如神学家们在600年前对陨落拜占庭帝国所做的一样。俄国不应也本不该为历史承担如此多的责任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、当事人的枯萎，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：抹去俄国在消灭纳粹中的贡献，而幻想出一场纯粹的欧洲“大西洋主义”的胜利，甚至是让俄国为两次世界大战负责，

失去地位。按常理，失败者是没有资格拥有历史的。但分裂和篡改历史遮蔽了欧洲人的视野，并为今日西方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埋下伏笔。

修正为了遗忘？

二战结束后，因为冷战和德国民主化，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流行着一股修正之风，有意抹杀苏联对二战胜利的贡献。

紧接着，梅栋开始分析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和美国在反俄上的不同表现和演变。

拿破仑1812年亲征俄罗斯前夕，曾命令一位作家写一本名叫《从诞生之初到14世纪的俄罗斯变强历程》的书。此书不断再版，并翻译成多种语言。书中主要评论了一份所谓的彼得大帝命令帝国扩张的遗嘱。据此，该书作者提倡各国孤立俄罗斯。直到1879年，这份所谓的遗嘱才被证伪，但这样的谎言已成功引起各国对俄国的畏惧。

从“贝壳放逐”到“橙色革命”

“流言耳语比武力更容易让人接受”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引发各地的“橙色革命”，如2004年和2014年的乌克兰、2004年的格鲁吉亚、2005年的吉尔吉斯。

在上述提及的现象中，梅栋回想起雅典的“贝壳放逐法”。他认为，结合19世纪到二战再到冷战的历史来看，俄罗斯的名字一直写在欧洲各国的贝壳上，俄罗斯总是那个被放逐、被排挤的国家。

当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，跟一千年前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们做着同一件事：他们重写关于俄国的历史，改变欧洲关于俄国的记忆，就如神学家们在600年前对陨落拜占庭帝国所做的一样。俄国不应也本不该为历史承担如此多的责任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、当事人的枯萎，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：抹去俄国在消灭纳粹中的贡献，而幻想出一场纯粹的欧洲“大西洋主义”的胜利，甚至是让俄国为两次世界大战负责，

吸引公众关注3月份的事态，将注意力放在俄国的动作上，营造出似乎俄国是罪魁祸首的错觉。最后一个技巧是制造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的区分，营造出感同身受的偏见和潜意识的反感。

树立假想敌，有史以来都是人性中一种可怕的倾向。1980年，萨达姆·侯赛因攻打伊朗阿亚图拉·霍梅尼时，似乎忽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1991年他试图收复科威特（1914年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），就更是如此。而普京不正是西方的现任假想敌吗？从上任之初，普京就一直被丑化，这也催生了许多控诉他的文章和讽刺漫画。

这些丑化愈来愈强烈，读者可到法文La Toile报的普京专栏上观察。但这种丑化也有其失败之处，“过分偏颇的题目、合成照和指责产生了相反的作用：由于如此不公正地描绘一个人物，我们必须很努力才能对他产生同情。所以，过分的丑化最终反倒激起民众对普京的同情”。

梅栋质疑，对俄国的非难和指责，应当考虑到俄国是一个横跨11个时区的地理巨国。这无疑增加了它的治理压力。“对于一个西方的自由主义者，无政府是美好的梦想，但对于一个俄罗斯人而言，是恶梦。”他特别强调，就如离婚时是由两个人承担责任，西方和俄国的分裂，也不应该由俄罗斯独自承担责任。在18世纪闪光人类历史的启蒙运动中，“平等”是核心价值之一，如果没有后来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腐蚀，今日欧洲会不会对俄罗斯平等以待呢？